

从三维转换到文化协商：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壮乡文化负载词的东盟外宣路径

陈芸生

南宁学院科研与学科建设处，广西 南宁

收稿日期：2025年8月11日；录用日期：2025年8月27日；发布日期：2025年9月9日

摘要

全球化背景下，壮乡文化负载词的东盟外宣存在语义空缺与文化误读问题，现有翻译理论难以适配其复合属性。本研究以生态翻译学为基础，引入文化协商理论，采用基于语料库的批判话语分析，考察2018~2024年相关外宣文本中的核心文化负载词，构建三维动态协商模型。研究发现：壮乡文化负载词翻译呈“三维动态失衡”，语言标准化与文化保真度显著负相关($r = -0.63, p < 0.01$)；73%的核心文化符号译介存在“去霸权化改写”；文化资本转化率因文本类型而异，学术文本(0.67)高于官方文本。研究提出语境敏感型权重调整机制、量化转化率评估体系，引入“属下能说话”理论探讨权力博弈。实践上建议构建“分级翻译机制”与共享数据库，为少数民族文化跨境传播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。

关键词

壮乡文化负载词，生态翻译学，文化协商，东盟外宣

From Three-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to Cultural Negotiation: ASEAN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Pathways for Zhuang Ethnic Culture-Loaded Te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-Translatology

Yunsheng Chen

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, Nanning University, Nanning Guangxi

Received: Aug. 11th, 2025; accepted: Aug. 27th, 2025; published: Sep. 9th, 2025

文章引用：陈芸生. 从三维转换到文化协商：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壮乡文化负载词的东盟外宣路径[J]. 现代语言学, 2025, 13(9): 378-383. DOI: 10.12677/ml.2025.139990

Abstract

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ization,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of Zhuang ethnic culture-loaded terms targeting ASEAN countries faces challenges of semantic gaps and cultural misinterpretation. Existing translation theories prove inadequate in addressing their complex attributes. Grounded in eco-translatology, this study introduces cultural negotiation theory and employs corpus-bas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o examine core culture-loaded terms in relevant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texts (2018~2024), constructing a three-dimensional dynamic negotiation model. The findings reveal a “three-dimensional dynamic imbalance” in the translation of Zhuang culture-loaded terms, with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observed between linguistic standardization and cultural fidelity ($r = -0.63$, $p < 0.01$). Furthermore, 73% of core cultural symbols undergo “de-hegemonized rewriting” during translation. The conversion rate of cultural capital varies significantly by text type, being higher in academic texts (0.67) than in official documents. The study proposes a context-sensitive weight adjustment mechanism and a quantitative conversion rate evaluation system, incorporating the “Can the Subaltern Speak” theory to explore the power game. Practically, it recommends establishing a “tiered translation mechanism” and a shared database,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upport for the cross-border dissemin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cultures.

Keywords

Zhuang Ethnic Culture-Loaded Terms, Eco-Translatology, Cultural Negotiation, ASEAN International Publicity

Copyright © 2025 by author(s) and Hans Publishers Inc.

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(CC BY 4.0).

<http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/4.0/>



Open Access

1. 引言

在全球化背景下，民族文化的跨境传播已成为国家软实力竞争的重要维度，而文化负载词作为特定文化体系的“意义浓缩体”，其外宣翻译的精准性直接影响文化传播的效度与深度。壮乡文化作为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[1]，蕴含着“那文化”“歌圩文化”等独特认知体系，其在东盟地区的传播既是广西自贸区“文化走出去”战略的核心任务，也是构建中国－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石。然而，当前壮乡文化负载词的外宣实践正面临双重困境：一方面，“三月三”“刘三姐”等核心概念在东盟语境中存在显著语义空缺；另一方面，“布洛陀”“姆洛甲”等创世神祇的译介常引发文化误读，东盟受众对“龙母”形象的解读常与西方“dragon”文化符号产生混淆[2]，导致文化传播的反向效果。这种“精准性困境”不仅制约着壮乡文化的国际话语权构建，更对中国－东盟文化互信机制形成潜在挑战。

现有研究围绕文化负载词翻译形成了三维理论路径：语言学派以 Newmark 的“语义翻译”为核心[3]，强调术语等值的形式化实现，但其对壮语“谐音双关”等语言特质的适配性不足；文化学派以 Venuti 的“异化理论”为框架[4]，主张保留源语文化异质性，却难以解决东盟多语种语境下的受众接受问题；交际学派则以 Nida 的“动态对等”为原则[5]，侧重传播效果优化，但容易导致文化信息的过度损耗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胡庚申提出的生态翻译学“三维转换”理论(语言维、文化维、交际维)为解决上述矛盾提供了新视角[6]，该理论将翻译视为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性选择，但其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的适用性仍存争议。然而，生态翻译学的“文化维主导论”难以解释少数民族文化在跨文明传播中的权力博弈关

系[7]; 现有三维转换模型缺乏对东盟多元文化生态的针对性设计, 导致壮乡文化负载词的译介常陷入“要么文化失真、要么传播失效”的二元对立[8]。

在学术层面, 既有的翻译理论框架未能充分涵盖少数民族文化负载词的“语言-文化-权力”复合属性, 导致壮乡文化外宣的理论解释力不足; 在实践层面, 广西非遗名录英译版(2023)中“歌圩”译为“songfair”、“那坡黑衣壮”译为“Black-clothes Zhuang”等案例显示, 缺乏系统性理论指导的译介实践正在消解文化符号的本真性。更为关键的是, 随着 RCEP 框架下中国-东盟文化贸易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, 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将直接影响壮乡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培育。

鉴于此, 本研究旨在以生态翻译学为基础框架, 通过引入文化协商理论, 构建适用于壮乡文化负载词的东盟外宣路径。研究的创新点体现在三方面: 其一, 突破三维转换理论的线性适配模式, 提出“语言维-文化维-交际维”的动态协商模型, 重点解析三者东盟多文化语境中的权重动态调整机制; 其二, 建立“文化资本转化率”评估指标, 量化分析翻译策略对文化符号价值传递的影响; 其三, 首次将 Spivak 的“属下能说话”理论引入民族文化译介研究[9], 探讨壮乡文化负载词翻译中的权力关系博弈。本研究的边界限定为: 语料范围聚焦 2018~2024 年间中国-东盟博览会官网、广西非遗名录英译版及《壮学丛书》英译本中的壮乡核心文化负载词; 研究对象限于壮语中具有不可替代性的物质文化、精神文化及制度文化词汇。通过上述研究, 力图为少数民族文化的跨境有效传播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。

2. 研究方法

本研究采用基于语料库的批判话语分析方法, 聚焦壮乡文化负载词东盟外宣文本的静态分析, 通过系统考察翻译文本的语言特征、文化表征与交际意图, 揭示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文化协商机制。这一方法论设计既延续了生态翻译学对翻译生态环境的关注[6], 又依托批判话语分析对文本权力结构的解读优势[10]。

2.1. 语料库的构建与处理

语料库采用“三维分层抽样法”, 严格限定为 2018~2024 年间已公开出版或发布的文本。其中, 中国-东盟博览会官网“新闻资讯”板块中明确标注“壮乡文化”主题的新闻稿、活动纪实共 126 篇, 总字数约 8.7 万字, 文本筛选以“壮语特有词汇出现频次 ≥ 3 次”为标准, 抽样覆盖中国-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(2021)、RCEP 生效(2022)等关键节点。选取最新发布的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》, 包含“布洛陀史诗”“壮族歌圩”等 47 个项目的说明文本, 总字数约 3.2 万字, 其双语平行对照格式为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对比提供了天然素材。《壮学丛书》选取 2019~2024 年间作品, 总字数约 15.6 万字, 通过分析译者序言、注释等元文本可直接获取翻译决策的语境说明。

语料处理严格遵循国际语料库语言学协会(ICAME)标准[11], 使用 AntConc4.0 软件完成文本清洗与格式统一, 剔除冗余的格式代码和无关信息; 采用 BCC 语料库分词标准进行词性标注, 确保语料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; 最终形成支持多维度检索的数据库, 为后续的编码分析奠定基础。

2.2. 编码框架与信效度保障

基于文本分析特性, 编码框架聚焦语言维、文化维与交际维三个维度, 所有指标均从文本本身提取数据。语言维聚焦翻译的术语规范化程度, 一方面统计同一文化负载词的译法变异系数, 以系数 ≤ 0.3 定义为“高度一致”, >0.5 则为“显著变异”; 另一方面从音系、词法、句法三个层面, 通过比对目标语通用语料库(如 BNC)的语言特征, 判断译法与目标语规范的契合度, 分为“完全契合”“部分调整”“显著偏离”三级。文化维侧重分析文本中的文化意象传递, 通过语义成分分析法计算译文中保留的核心意象占比, 分为“完全保留”(≥80%)、“部分保留”(30%~79%)、“完全替换”(<30%)三级, 同时统计译文

中针对文化特有概念的解釋性文字占比，反映译者对目标语境的预判性适应。交际维通过文本内在特征推断交际效果，既分析译文中针对东盟文化的调适痕迹，通过比对东盟主流媒体(如《联合早报》)的同类文化报道用词判断译法的语境适切性，也计算译文中文化负载词的信息单位与源语的对应比例，量化翻译过程中的信息损耗。

编码框架通过德尔菲法验证，邀请 5 位翻译学与壮学专家进行两轮评审，Kappa 系数达 0.87，表明指标体系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。为确保文本分析的可靠性，研究采用多重质量控制措施。信度检验方面，由两位研究者独立编码，计算组内相关系数(ICC)，语言维、文化维、交际维的 ICC 值分别为 0.89、0.85、0.91，均高于 0.8 的可接受标准，表明编码结果具有稳定性。效度验证通过三角验证法，将语料库分析结果与译者序言、编辑说明等元文本进行比对，确保研究结论与文本生成语境的一致性。此外，对所有语料标注明确的出版信息，确保每一条分析数据均可追溯至原始文本，避免二次加工信息的干扰。通过上述设计，本研究将“文化协商”这一抽象概念转化为可通过文本分析直接验证的指标体系，为壮乡文化负载词的东盟外宣路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方法论支撑。

3. 发现与讨论

3.1. 核心发现概述

本研究通过对壮乡文化负载词东盟外宣文本的系统分析，揭示出三个关键发现：其一，壮乡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呈现“三维动态失衡”特征，语言维的术语标准化程度(平均变异系数 0.42)与文化维的意象保留度(平均保留率 68%)呈现显著负相关($r = -0.63, p < 0.01$)，表明现有译介实践中存在“形式精准与文化保真”的两难选择；其二，权力博弈深刻影响翻译决策，在“龙母”“布洛陀”等核心文化符号的译介中，73%的案例选择“去霸权化改写”(如将 Dragon Mother 调整为 Water Goddess)，这种调适与东盟媒体的宗教文化语境(如马来西亚《星洲日报》对“水神”意象的高频使用)呈现高度契合(匹配度 81%)；其三，文化资本转化率存在显著文本差异，《壮学丛书》英译本的平均转化率(转化率评估公式 = 保留度 × 接受度 ÷ 认知成本)达 0.67，显著高于中国—东盟博览会官网文本(0.42)和非遗名录(0.53)，在同为具有一定水平的专业译者和常见目标群体中，表明学术文本的注释体系对文化价值传递具有更好的效果，见表 1。

Table 1.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cultural capital conversion rates for Zhuang ethnic culture-loaded terms

表 1. 壮乡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对比及文化资本转化率

源语文化负载词	现有译法案例	翻译策略	文化资本转化率	关键差异分析
歌圩	“song fair”	归化(功能替换)	0.41	丢失“群体歌唱 + 文化认同协商”核心意象
	“Ge Xu (Zhuang’s singing gathering with cultural identity negotiation)”	音译 + 功能注释	0.73	保留文化特异性且适配东盟受众认知
那文化	“paddy culture”	归化(语义缩减)	0.31	丢失“稻作信仰为核心的世界观”文化维度
	“Na Culture (the Zhuang’s paddy-centered worldview)”	音译 + 文化注释	0.72	完整传递文化资本内涵
布洛陀	“Buluotuo” (仅音译)	异化(无注释)	0.58	认知成本高，东盟受众理解度低
	“Buluotuo (Zhuang’s creation god)”	音译 + 谱系注释	0.86	平衡文化本真性与传播效率

3.2. 理论意义与创新对话

上述发现对生态翻译学和跨文化传播理论形成了双重拓展。针对胡庚申[6]提出的“三维转换”线性模型,本研究发现壮乡文化外宣中语言、文化、交际三维的关系并非静态平衡,而是呈现“语境敏感型权重调整”——在东盟宗教多元地区(如印尼、马来西亚),文化维权重自动提升(平均占比 47%),而在华人聚居区(如新加坡),语言维标准化程度显著提高(变异系数降至 0.29)。这种动态机制修正了“文化维主导论”的绝对化倾向[7],为生态翻译学的本土化适配提供了实证依据。

与 Venuti 的“异化-归化”二元框架相比,本研究提出的“文化协商”模型更能解释少数民族文化的跨境传播规律。在“歌圩”译介案例中,既非完全异化(保留“Ge Xu”音译)也非彻底归化(译为“folk festival”),而是采用“音译+功能注释”(“Ge Xu (Zhuang's singing gathering with cultural identity negotiation)”)的混合策略,这种实践印证了 Spivak“属下能说话”的理论预判——通过翻译策略的能动性选择,边缘文化得以在权力结构中实现意义突围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种协商机制与“二元对立”现象形成对比,其差异源于本研究对东盟文化内部异质性的充分考量。

在文化资本理论应用方面,本研究构建的“转化率评估公式”突破了文化资本理论的定性描述局限。数据显示,“那文化”译为“paddy culture”时转化率仅 0.31(因丢失“稻作信仰”核心意象),而译为“Na Culture (the Zhuang's paddy-centered worldview)”时转化率升至 0.72,这一量化结果为文化符号的价值传递效率提供了可操作的评估工具。

3.3. 未来方向与实践启示

未来研究可从两方面拓展:一是开展跨学科合作,结合认知语言学的眼动实验,测量东盟受众对不同译法的视觉注意力分配,为“认知成本”指标提供神经科学证据;二是建立追踪研究模型,对同一文化负载词的译法演变进行历时分析,探索翻译生态环境的变迁规律。

实践层面,建议广西自贸区构建“分级翻译机制”:核心文化词(如“布洛陀”“姆洛甲”)采用“音译+文化谱系注释”策略,确保本真性传递;边缘文化词(如“壮锦纹样”)可采用“功能对等+意象重构”方法,提升传播效率。同时,可依托中国-东盟博览会平台建立“文化译介共享数据库”,收录经过转化率验证的标准化译法,为外宣实践提供参考。这一机制既符合民族文化译介的规范化需求,又保留了文化协商的灵活空间,有助于实现壮乡文化在东盟地区的有效传播与价值增值。

4. 结论

本研究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基础,通过分析壮乡文化负载词在东盟外宣文本中的翻译实践,揭示了少数民族文化跨境传播的“文化协商”机制。研究发现,壮乡文化负载词的译介呈现三维动态调整特征,语言标准化与文化保真度的负相关关系($r = -0.63, p < 0.01$)打破了传统翻译理论的静态平衡预设;权力博弈对核心文化符号的译法选择具有显著影响,73%的“去霸权化改写”案例印证了边缘文化在跨文明传播中的能动性;文化资本转化率的文本差异(学术文本 0.67 vs 官网文本 0.42)则表明注释体系对文化价值传递的良好效果。这些发现共同构建了从“被动转换”到“主动协商”的理论认知框架。

在理论层面,本研究的创新体现为三方面:其一,修正了生态翻译学“三维转换”的线性模型,提出“语境敏感型权重调整”机制,解释了东盟多元文化语境中语言维、文化维、交际维的动态适配规律,为该理论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本土化补充;其二,将 Spivak 的“属下能说话”理论引入翻译研究,通过“歌圩”等案例的混合译法分析,揭示了边缘文化借助翻译策略实现意义突围的实践路径,拓展了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应用边界;其三,量化构建“文化资本转化率”评估公式,将 Bourdieu 的文化资本理论转化为可操作的翻译效果测量工具,实现了从定性描述到定量分析的方法论突破。

实践价值上,研究提出的“分级翻译机制”具有直接应用意义:核心文化词的“音译+文化谱系注释”策略(如“布洛陀”译为“Buluotuo (Zhuang's creation god)”)可保障文化本真性,边缘文化词的“功能对等+意象重构”方法(如“壮锦纹样”译为“Zhuang brocade patterns with totemic meanings”)能提升传播效率。

从推广应用前景看,研究构建的“文化协商”模型不仅适用于壮乡文化,对藏、蒙、维等少数民族文化的跨境传播具有同样参考价值;其量化分析方法可为国家文化“走出去”战略中的翻译质量评估提供范式借鉴,助力构建更具针对性的民族文化外宣体系。随着 RCEP 框架下文化贸易的深化,本研究成果对提升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长远意义。

基金项目

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《广西“海、江、边”区域背景面向东盟国家的壮乡外宣公示语翻译研究》(2022KY1764)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黄璐. 民族文化艺术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研究——以花山岩画艺术为中心的考察[J]. 广西民族研究, 2024(5): 154-161.
- [2] 雷欣翰. 早期熊神话的原型编码及其神话历史研究[J]. 中国比较文学, 2023(1): 245-263.
- [3] Newmark, P. (2001) *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*.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.
- [4] 劳伦斯·韦努蒂. 译者的隐形——翻译史论[M]. 北京: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, 2009.
- [5] 尤金·奈达. 翻译科学探索[M]. 上海: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, 2004.
- [6] 胡庚申. 生态翻译学: 建构与诠释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13.
- [7] 宋绍玲, 陈丽珠. 生态翻译视角下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探究——以安德鲁·琼斯英译《许三观卖血记》为例[J]. 现代语言学, 2025, 13(1): 477-485. <https://doi.org/10.12677/ml.2025.131068>
- [8] 彭劲松. 论壮语文化负载词的异化翻译[J].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 2017, 53(4): 112-116.
- [9] Spivak, G.C. (1988) *Can the Subaltern Speak?* Macmillan Education UK.
- [10] 林亚军. Fairclough 的话语观: 引进与诠释[J]. 外语学刊, 2008(5): 69-72.
- [11] 邵斌, 王文斌. 英语语料库语言学的最新发展——2012 年国际语料库语言学会 ICAME 33 综述[J]. 当代外语研究, 2012(11): 71-74.